

生态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的视角

曹鸿杰 李美娜 祁毓

摘要: 基于补偿视角建立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是绿色发展背景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纵向政府间财政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基于中国大陆地区 2003-2020 年的面板数据,以 2008 年试点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作为政策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生态转移支付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生态转移支付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中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改善生态环境是其推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机制,这一促进作用从东部地区往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减弱,且存在对共同富裕水平较高地区促进作用较强的“马太效应”。

关键词: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态转移支付; 共同富裕; 双重差分

中图分类号: F812.45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中国已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并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擘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但是,我国不同地区间在收入、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仍存在明显差异,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发展成果全员共享的公平性,进而制约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李实和杨一心, 2022)。为了协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激励措施。其中,中国从生态补偿视角尝试建立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为代表的生态转移支付政策,以协调区域均衡发展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脱贫攻坚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旨在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创新中体现了环境和民生的要求,将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力。

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中央财政部在一般转移支付下设立生态转移支付,其兼具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生的双重政策导向。首先,从政策目标的角度来看,在 2008 年试点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主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目标中逐步融入了基本公共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总体目标的国家发展战略: 2011 年,提出加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在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的保障能力; 2018 年,生态转移支付支持范围进一步扩展至“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2022 年,重点补助范围中加入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地区。这为其促进共同富裕的功能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其次,从转移支付资金规模的角度来看,生态转移支付作为政府财政补偿的重要方式,具有实现政府间纵向财力再分配、促进地区财力均衡的功效,这对提高社会公平与效率、优化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发挥着重要作用(刘明慧和章润兰, 2021)。具体来说,生态转移支付从 2008 年的 60.51 亿元提高到 2022 年的 982.04 亿元,增长了 15.23 倍之多,其占中央对地方总转移支付的比重也从 2008 年的

* 曹鸿杰,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邮编: 266061, 邮箱: jaytsuo@qdu.edu.cn; 李美娜, 青岛大学硕士研究生, 邮编: 266061, 邮箱: lmeina2021@163.com; 祁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财税系主任, 邮编: 430073, 邮箱: qiyu1987918@126.com。

0.20%提高到 2021 年的 1.04%。如此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在促进生态环境改善之余，是否有助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以及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通过何种机制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鉴于此，本文基于因果推断方法，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作为政策冲击，对其政策效应进行评估，识别生态转移支付政策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实现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检验其中的影响机制。首先，在有效衡量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基于 2003-2020 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识别生态转移支付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并进行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其次，同时从经济增长率和生态环境状况双重角度出发，探讨生态转移支付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影响路径。最后，从中国分区域、共同富裕水平、共同富裕维度三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生态转移支付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改善生态环境状况，进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一促进作用从东部地区往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递减，且存在“马太效应”，对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强，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绿色发展和区域协调视角出发，考察生态转移支付对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影响，丰富拓展了现有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的内容；第二，使用因果关系推断法，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作为政策冲击，更加精确地识别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三，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识别了生态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规律，对提高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代表的生态补偿的政策精准性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文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模型设定；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相对于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仍与世界发达国家具有较大差距，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李实，2021；李实和朱梦冰，2022）。这意味着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仍需要继续做大“蛋糕”，才能在此基础上分好“蛋糕”。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城乡、地区间受城乡二元结构和财政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在收入差距以及教育、医疗和环境等方面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特征（李实和杨一心，2022）。只有通过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重要社会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机会不平等和实现社会正义。同时，这些目标的实现也将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晏景瑞和朱诗怡，2022）。当前，学者们基于时代背景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深刻理解共同富裕概念要同时抓住“富裕”和“共享”两个关键词。共同富裕并不是全体人民的均等富裕，而是在整体上达到富裕水平，即在整体富裕程度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的收入和财富积累均达到富裕水平的最低标准，公平的享有基本权利和机会以及人人参与共建共享发展成果（刘培林等，2021；李军鹏，2021）。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要在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上，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和空间分布，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李实，2022；端利涛和蔡跃州，2023）。促进“提低”“扩中”意味着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要高于整体的经济增长水平，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率至少与整体经济增长水平保持同步（李实和朱梦冰，2021）。收入差距过大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而收入差距过小则会影响社会的效率与公平，使低收入群体产生惰性、中高收入群体的效率低下。因此，在促进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实现的过程中要确保收入差距维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刘培林等，2021）。除此之外，在已有对共同富裕影响因

素研究的文献中，学者们认为我国共同富裕水平还受城镇化水平、科技水平、户籍制度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其中，城镇化水平主要通过优化城乡空间布局、缓解城乡差异，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万广华等，2022；赵丽琴等，2023）；科技水平下的科技创新、金融科技以及数字技术等均可以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效率、促进公平来推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陈曦，2022；孙继国和孙尧，2022；张金林等，2022）；户籍制度会制约人力资本要素的自由流动，并通过影响区域间收入差距以及就业机会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Fox, 2016；程名望等，2022；Tang & Sun, 2022）；收入分配制度下的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政策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再分配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Molero-Simarro, 2017；李丹等，2019；郭健等，2022）。

转移支付制度作为政府间纵向财力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协调作用。研究表明，财政转移支付能够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李丹等，2019），促进家庭消费支出（朱德云和王溪，2022），以及通过提高地方财政民生性支出占比和增加就业机会推动中国贫困治理（刘明慧和章润兰，2021；王昉和燕洪，2022）。这为财政转移支付有利于推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当前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纵向的生态转移支付对保障居民基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曹鸿杰等，2020）。在此基础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又通过财富和资源的二次分配减少社会不平等，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姜晓萍和吴宝家，2022）。除上述生态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作为一般转移支付下最具有代表性的财政生态转移支付，对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率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促进共同富裕产生了间接影响。其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政策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吸引外商投资，从而间接的促进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张朝举和陈怡心，2021；周杰琦和张莹，2021）。其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在经济增长方面产生间接推动效应（侯孟阳等，2023），也为缩小区域和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程名望等，2022）。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密切相关（张化楠等，2018；Mallawaarachchi & Rahut, 2023），将生态补偿项目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结合是当前国内环境下的大势所趋，也是重要的政策导向之一。实现共同富裕是在消除绝对贫困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战略目标，因此，生态转移支付在理论上能够有效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崔惠玉，2022）。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达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环节。当前，共同富裕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学者们对共同富裕的研究多限于其内涵、实现路径和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对生态转移支付的研究则多是探讨其对生态环境和贫困状况的影响，鲜有实证研究生态转移支付政策在改善民生的政策目标下，对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具有的影响及机制。因此，本文的研究会对丰富共同富裕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完善生态转移支付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影响路径，以及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模型设定

（一）模型构建

2022 年中央财政部印发的《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中指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重点补助范围包括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的地区，这为其促进共同富裕的功能提供了坚实的政策背景。中国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始于 2008 年财政部出台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同年，根据环境保护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编制并发布的《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在山西、内蒙古、吉林等 17 个省级地区内划定

216 个生态功能区，并由中央对生态功能区所在省级地区进行资金补助。2009 年在河北、安徽、福建等 6 个省级地区内划定生态功能区，2010 年和 2011 年在辽宁和山东两个省级地区继续新增了部分生态功能区，2012 年生态功能区划实现了中国大陆地区 31 个省级地区全覆盖。为了探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是否可以有效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利用这一政策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并控制不同年份的时间差异和不同省级地区的个体差异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构建年份-省份双向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如下式（1）所示：

$$compros_{it} = \alpha_0 + \beta treated_i \times post_{it} + \sum_{k=1}^5 \gamma_k x_{k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上式中，被解释变量 $compros_{it}$ 表示 i 省在 t 年的共同富裕水平，本文从富裕度和共同度两个方面，由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四个指标通过熵值法合成。 $treated_i$ 表示自 2008 年起行政区内划定生态功能区并获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省份虚拟变量，由于 2012 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实现了 31 个省级地区全覆盖，故本文中 $treated_i=1$ 。 $post_{it}$ 表示各省份获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时间虚拟变量，由于政策实施当年及之后的年份该省才会受到政策冲击，故各省政府获得来自中央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第一年及之后年份 $post_{it}=1$ ，其余 $post_{it}=0$ ，由于不同省级地区开始获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年份不同，因此以 i 作为区分。交互项 $treated_i \times post_{it}$ 表示划定生态功能区并开始获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即开始受到政策冲击的省份，其系数 β 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实施的平均处理效应。 x_{kit} 表示影响 i 省共同富裕水平的其它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密度、产业结构高级化、财政自由度和对外开放程度。除此之外， μ_i 表示省份固定效应； η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是共同富裕指数 ($compros$)。为了更准确客观的衡量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已有研究从共同度和富裕度两个方面着手（万海远和陈基平，2021；袁惠爱等，2022；王桂虎等，2022），由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城镇登记失业率^①和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四个指标通过熵值法合成各省级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并对其进行了标准化。指数越大共同富裕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用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

2. 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 (did)。自 2008 年起，中央开始在山西、内蒙古、吉林等 17 个省级地区内划定生态功能区，并经过四年的逐步完善，于 2012 年实现了生态功能区划在中国大陆 31 个省级地区内的全覆盖，即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现中国大陆 31 个省级地区全覆盖。本文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作为政策冲击，并以省份虚拟变量 $treated_i$ 和时间虚拟变量 $post_{it}$ 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

3. 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降低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参考已有学者对共同富裕的研究文献（程名望等，2022；郭健等，2022；李红坤和祁永正，2022；Tang et al., 20222），本文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以下几个重要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 ($pgdp$)，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2）地区人口密度 ($density$)，用各省级地区 2003-2020 年的年末常住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的比值（人/平方公里）来控制人口特征因素。（3）对外开放程度 ($open$)，用人民币汇率换算后的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来衡量。（4）产业结构 ($ratstr$)，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5）政府财政能力 (gov)，用各省政府人均一般财政支出衡量。

① 由于早期农村的就业数据统计不完全，数据缺失，此处用城镇登记失业率代替人均水平。

（二）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中国大陆 31 个省级地区 2003-2020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中各类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财政部中央预决算平台以及各省统计局、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部分变量数据的缺失值通过各省统计年鉴和当年的统计公报补充，并严格对比了相关数据与其他年份中数据的差异，仅填补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的观测值，对于差别较大的数据按缺失值处理。在数据使用过程中，为了使数据更具有可比性，本文将所有非比值和非指数类数据进行了人均处理，并对其中涉及货币量的数据均以 2003 年为基期，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中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单位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i>compros</i>	共同富裕指数	无	24.48	17.47	0	100	558
<i>pinc</i>	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1.23	0.78	0.28	4.82	558
<i>pcon</i>	人均消费支出	万元	0.90	0.52	0.21	3.06	558
<i>runemp</i>	城镇登记失业率	%	3.49	0.70	1.20	6.50	554
<i>gap</i>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比值	2.78	0.51	1.85	5.24	558
<i>did</i>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	无	0.66	0.47	0	1	558
<i>pgdp</i>	经济发展水平	万元/人	2.87	1.91	0.37	11.41	558
<i>density</i>	地区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429.80	644.60	2.26	3924	558
<i>open</i>	对外开放水平	%	3.29	6.41	0	69.17	558
<i>ratstr</i>	产业结构	比值	0.89	0.06	0.66	0.10	558
<i>gov</i>	政府财政能力	万元/人	0.69	0.55	0.07	3.93	558
<i>growth</i>	经济增长率	%	12.86	6.28	-5.34	29.81	558
<i>ps02</i>	人均SO ₂ 排放量	吨/人	150.50	129.70	0.81	644.70	558
<i>theil</i>	泰尔指数	%	10.59	5.03	1.80	27.60	496
<i>absrev</i>	地区收入差距	万元	0.40	0.44	0	2.767	558
<i>purinc</i>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人	1.71	0.81	0.65	5.24	558
<i>pruinc</i>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人	0.66	0.39	0.16	2.31	558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首先，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式（1）中基于省份-年份双向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其次，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熵值法测得的各省共同富裕水平，解释变量是自 2008 年开始施行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这一政策冲击。再次，为了分析遗漏变量是否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模型（4）（5）（6）依次在模型（1）（2）（3）的基础上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最后，为了探讨不同类型标准误是否会引起估计结果显著性的变化进而影响实证结果的可信性，模型（1）（2）（3）和模型（4）（5）（6）中依次分别采用普通标准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和省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第一，生态转移支付显著促进了各省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1）（2）（3）中，分别采用不同类型的标准误，生态转移支付对各省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在 5% 和 1% 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的模型（4）（5）（6）中，分别采用不同类型的稳健标准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对各省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随着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加入，政策实施的平均处理效应有所降低，显著性有所提高，控制变量的加入有效降低了估计误差。模型中采用不同类型的标准误没有对政策实施的平均处理效应产生影响，也没有使其显著性发生较大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结论的可靠性。估计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后，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高 1.159%，即生态转移支付有利于各省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分析其原因，首先是中央对地方的生态转移支付有利于提高各省政府的财政能力，通过其财政杠杆作用，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进而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其次是生态转移支付在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同时，优化了本地区的生活环境和营商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和提高就业水平，进而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第二，控制变量的影响。控制变量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模型中的遗漏变量问题，有效降低了估计误差。本文实证结果中一系列控制变量对各省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与预期基本一致，如表 2 中所示：经济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 4.512，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将有利于提高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进而促进各省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地区人口密度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为 0.026，人口聚集会促进经济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进而有利于各省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在采用普通标准误和异方差稳健标准误时，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为-0.088，其原因可能是外商直接投资大多投向城市大型跨国贸易企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进而不利于共同富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政府财政能力对共同富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表 2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6)
<i>did</i>	1.9529** (2.09)	1.9529** (2.47)	1.9529*** (3.90)	1.1585*** (3.59)	1.1585*** (3.98)	1.1585*** (3.71)
<i>pgdp</i>				4.5115*** (27.95)	4.5115*** (18.58)	4.5115*** (8.07)
<i>density</i>				0.0258*** (25.52)	0.0258*** (9.25)	0.0258*** (11.24)
<i>open</i>				-0.0880*** (-5.37)	-0.0880** (-2.34)	-0.0880 (-1.10)
<i>ratstr</i>				-19.2205*** (-5.25)	-19.2205*** (-6.41)	-19.2205*** (-2.76)
<i>gov</i>				-0.2880 (-0.90)	-0.2880 (-0.70)	-0.2880 (-0.48)
<i>cons</i>	23.1885*** (36.12)	23.1885*** (52.82)	23.1885*** (70.09)	17.2269*** (5.13)	17.2269*** (5.60)	17.2269** (2.60)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558	558	558	558	558	558
<i>F</i>	4.37	6.10	15.24	640.20	224.10	106.70
<i>r2_a</i>	0.945	0.945	0.945	0.994	0.994	0.99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需要满足平行趋势的前提假设,即共同富裕水平的变化趋势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之前没有显著区别,实施之后的发展趋势具有显著不同,这样通过两次差分得到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系数 β 才能较真实反应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本文参考 Beck 等的做法,构建平行趋势检验模型 (Beck et al., 2010),如下式 (2) 所示:

$$compros_{it} = \alpha_0 + \sum_{\tau=1}^4 \beta_{-\tau} D_{it-\tau} + \sum_{\tau=0}^4 \beta_{+\tau} D_{it+\tau} + \sum_{k=1}^5 \gamma_k x_{kit} + \mu_i + \e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D_{it-\tau}$ 表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之前第 τ 年的虚拟变量,若省份 i 属于政策实施前的第 τ 年则 $D_{it-\tau}=1$, 否则 $D_{it-\tau}=0$; $D_{it+\tau}$ 表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之后第 τ 年的虚拟变量,若省份 i 属于政策实施后的第 τ 年则 $D_{it+\tau}=1$, 否则 $D_{it+\tau}=0$ 。因此, $\beta_{-\tau}$ 和 $\beta_{+\tau}$ 分别表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前后对各省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效果。本文以政策实施前的 4 年和政策实施当年以及政策实施后的 4 年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并以政策实施前的第 4 期作为基准年舍去。图 1 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前后回归结果的差异变动趋势,上下区间代表 95% 的置信区间。

如图 1 所示,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前,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异于 0,即各省级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的变化趋势没有显著差异,政策实施当期开始系数显著异于 0 并持续多期。因此,本文使用的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定。进一步,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系数逐年递增。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覆盖规模的不断扩大,相邻省级地区间的替代效应逐渐减弱,各省更加注重全方面地发展建设,故生态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不断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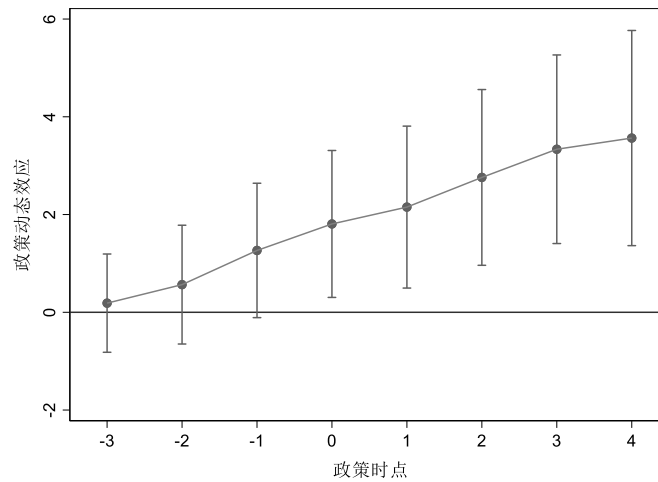


图 1 事件研究法的平行趋势检验

注: x 轴表示政策实施政策时点, y 轴表示被解释变量回归系数, 虚线区间表示 95% 的置信区间。

2. 安慰剂检验

本文基准回归部分验证了生态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水平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为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是否受其它未观测到的因素影响,以及是否出于偶然得到的结论,本文参照已有相关文献(周茂等, 2018; 孙鹏博和葛力铭, 2021),进行了重复 1000 次的安慰剂检验。具体过程如下,将前文中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实施时间和对应省级地区打乱顺序后重新进行 1000 次抽样组合,用模型 (1) 式对随机抽取的受政策冲击的省级地区重新

进行回归。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2 所示，随机样本的系数估计均值集中在 0 附近，与真实值 1.159 相距较远，表明估计结果未受其它未观测到因素的系统性影响，基准回归结果也非偶然所致，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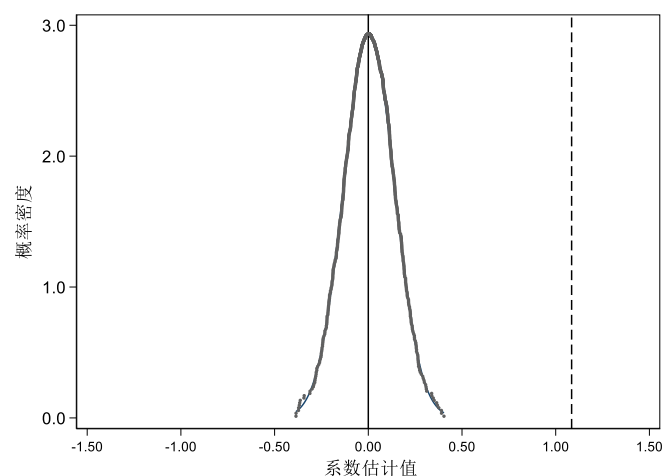


图 2 1000 次随机抽样的安慰剂检验

注：图中垂直虚线代表系数真实估计值。

3. 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法

基准回归部分，本文从共同度和富裕度两个方面，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四个指标，采用熵值法合成共同富裕指数。为了避免在共同富裕指数合成中，因各指标所赋权重差异导致结果偏误，本部分借鉴张金林等（2022）的研究，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共同富裕指数进行重新测度。回归结果如表 3 中所示，无论是否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采用哪一种标准误，生态转移支付的影响系数仍然显著为正，验证了生态转移支付促进共同富裕的结论的稳健性。

表 3 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变量	(1)	(2)	(3)	(4)	(5)	(6)
<i>did</i>	0.1902*** (3.90)	0.1902*** (4.11)	0.1902*** (3.53)	0.0806*** (4.51)	0.0806*** (4.67)	0.0806*** (3.81)
<i>pgdp</i>				0.2787*** (30.33)	0.2787*** (19.90)	0.2787*** (7.86)
<i>density</i>				0.0017*** (18.89)	0.0017*** (10.62)	0.0017*** (4.73)
<i>open</i>				-0.0048*** (-5.23)	-0.0048** (-2.56)	-0.00480 (-1.19)
<i>ratstr</i>				-1.4336*** (-7.13)	-1.4336*** (-8.34)	-1.4336*** (-3.38)
<i>gov</i>				-0.0955*** (-5.43)	-0.0955*** (-4.31)	-0.0955** (-2.36)
<i>cons</i>	-0.1267*** (-3.76)	-0.1267*** (-4.48)	-0.1267*** (-3.53)	-0.1860 (-1.00)	-0.1860 (-1.08)	-0.1860 (-0.44)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554	554	554	554	554	554

<i>F</i>	15.22	16.93	12.44	582.60	237.60	39.40
<i>r2_a</i>	0.954	0.954	0.954	0.994	0.994	0.99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4.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 (PSM-DID)

生态功能区的划定和生态转移支付的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会取决于当地的生态环境状况以及经济发展程度,这可能导致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违反外生的自然干预这一前提假定。因此,为修正样本自选择偏差并得到真实的 DID 模型估计结果,本部分利用 PSM-DID 方法,分别采用 1:1 和 1:2 最近邻匹配、卡尺范围设定为 0.005 的半径匹配以及核匹配进行匹配,并对模型重新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4 中所示,无论采用哪一种匹配方法,生态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差不大,验证了生态转移支付促进共同富裕的结论。

表 4 PSM-DID 法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最邻近匹配 (k=1)	最邻近匹配 (k=2)	半径匹配 (卡尺=0.005)	核匹配
<i>did</i>	1.5230*** (0.43)	1.4940*** (0.40)	1.0850** (0.44)	0.9150*** (0.27)
<i>pgdp</i>	3.9660*** (0.29)	3.8940*** (0.28)	4.2990*** (0.32)	4.5470*** (0.23)
<i>density</i>	0.0395*** (0.003)	0.0407*** (0.003)	0.0383*** (0.003)	0.0285*** (0.003)
<i>pso2</i>	0.0012 (0.001)	0.0015 (0.001)	0.0019 (0.001)	0.0021* (0.001)
<i>ratstr</i>	-13.5100*** (2.61)	-11.7900*** (2.67)	-15.1800*** (2.90)	-18.8900*** (3.33)
<i>gov</i>	-0.3710 (0.34)	-0.4530 (0.35)	-0.8880** (0.45)	-0.5590 (0.41)
<i>cons</i>	10.6800*** (2.53)	8.8660*** (2.50)	12.0700*** (2.73)	15.9300*** (3.18)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420	434	333	554
<i>F</i>	206.18	219.57	179.64	248.27
<i>r2_a</i>	0.997	0.997	0.996	0.99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5.多期 DID 的异质性处理效应

已有研究指出,不同处理组个体因开始受到处理的时间不同,其平均处理效应也会有所差异,而多期双重差分估计是对不同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的加权平均,在某些情况中所赋权重的正负可能会使估计结果出现偏误 (De Chaisemartin & D'Haultfoeuille, 2020; Goodman-Bacon, 2021)。因此,本部分参考 Gardner (2021) 的研究,使用两阶段双重差分方法对处理效应进行识别以及时间研究分析。第一阶段是使用未被处理的样本对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进行回归,第二阶段是从处理组观察到的结果中减去第一阶段中的个体和时间固定

效应，并根据处理状态对调整后的结果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 中所示，生态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且其影响系数逐年递增，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5 *did2s* 的平均处理效应及分时期效应

<i>Did2s</i> -总体 ATT		<i>did2s</i> 分时期效应	
<i>DID</i>	2.1480***	F_1	-0.0627
	(0.61)		(0.19)
		F_2	-0.1339
			(0.17)
		L_0	0.2716
			(0.28)
		L_1	0.7820**
		(0.33)	
		L_2	0.8582**
			(0.42)
		L_3	1.3876**
			(0.5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三) 作用机制分析

本文共同富裕水平指标是从共同度和富裕度两个方面，由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四个指标通过熵值法合成。基于此，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得出生态转移支付有效提高了各省的共同富裕水平，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接下来，本部分将探讨生态转移支付对各省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机制。一方面，考虑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李实和朱梦冰，2022），而经济高度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因此，生态转移支付可能会通过影响经济增长率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生态转移支付是直接针对生态环境的财政补偿，而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吸引外商投资（王晨等，2022），进而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Cieplinski et al., 2021）。

基于上述说明，本文从经济增长率和生态环境状况两个角度出发，探讨生态转移支付是否通过这两个机制对提高各省共同富裕水平产生影响。其中，生态环境状况用各省人均二氧化硫排放总量^①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回归结果如表 6 中所示：首先，在模型（1）和模型（3）中，无论是否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生态转移支付对各省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 2.223 和 2.372。这一结果表明，生态转移支付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进而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其次，在模型（2）和模型（4）中，无论是否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生态转移支付对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分别为-0.279 和-0.159。这一结果表明，生态转移支付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公平，从而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①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包括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

表 6 机制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经济增长率	(2) 生态环境	(3) 经济增长率	(4) 生态环境
<i>did</i>	2.2226*** (3.45)	-0.2789*** (-3.65)	2.2162*** (3.52)	-0.2046*** (-3.46)
<i>pgdp</i>			-0.1760 (-0.61)	-0.3463*** (-5.28)
<i>density</i>			-0.0014 (-0.79)	-0.0020*** (-5.15)
<i>open</i>			0.0136 (0.39)	-0.0026 (-0.70)
<i>ratstr</i>			23.0356*** (3.22)	1.1931* (1.71)
<i>gov</i>			2.2489*** (3.80)	0.6183*** (5.35)
<i>cons</i>	11.3877*** (25.95)	4.7466*** (99.54)	-9.5200 (-1.43)	5.0845*** (8.11)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558	558	558	558
<i>F</i>	11.93	13.33	6.93	27.02
<i>r2_a</i>	0.787	0.874	0.796	0.93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四) 异质性分析

1. 分区域异质性

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受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①在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异质性明显。为了缓解地区间差异,促进各地区全方位平衡发展,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向相对落后地区进行资金转移。2008年中央政府开始在山西、内蒙古等17个中、西部地区划定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并对其进行资金补偿。截至2021年,中央向31个省级地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市、区)转移支付资金规模达871亿元,其中半数以上的资金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基于此,本部分进一步探讨生态转移支付对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影响的异质性,设定虚拟变量 $uneast$,若该省级地区属于东部地区则 $uneast=0$,若该省级地区属于中部地区则 $uneast=1$,若该省级地区属于西部地区则 $uneast=2$ 。回归结果如表7中所示,生态转移支付对各省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基础回归部分结论一致,故此处我们仅对与区域异质性相关的交互项进行说明。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 $uneast$ 和 did 交互项的系数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分别为-4.757和-0.952即生态转移支付对各省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从东部地区往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其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中国各省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生态转移支付作为来自中央的财政补偿,对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也因此依次减弱;第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所包含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

^① 三大地区划分:东部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辽宁省11个省级地区;中部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8个省级地区;西部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2个省级地区。

发区域大多位于中国中、西部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开发和资源利用能力,影响了生态转移支付促进共同富裕效应的发挥;第三,中、西部地区民生性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为薄弱,这将降低当地的生态承载能力、制约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放松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进而影响生态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的发挥。因此,为了有效提高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以及充分发挥生态转移支付的脱贫攻坚功能,政府要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的生态转移支付政策。

表 7 区域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i>did</i>	5.4749*** (7.98)	5.4749*** (8.24)	5.4749*** (4.34)	1.7292*** (5.38)	1.7292*** (6.12)	1.7292*** (3.25)
<i>did×uneast</i>	-4.7565*** (-14.61)	-4.7565*** (-11.13)	-4.7565*** (-3.98)	-0.9519*** (-5.22)	-0.9519*** (-5.09)	-0.9519*** (-2.18)
<i>pgdp</i>				4.3172*** (27.37)	4.3172*** (19.00)	4.3172*** (7.58)
<i>open</i>				-0.0603*** (-3.76)	-0.0603* (-1.83)	-0.0603 (-0.84)
<i>ratstr</i>				-17.5252*** (-5.18)	-17.5252*** (-6.17)	-17.5252*** (-2.59)
<i>gov</i>				0.1240 (0.40)	0.1240 (0.30)	0.1240 (0.20)
<i>cons</i>	24.3399*** (51.33)	24.3399*** (54.75)	24.3399*** (43.64)	17.4269*** (5.57)	17.4269*** (6.06)	17.4269*** (2.50)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554	554	554	554	554	554
<i>F</i>	116.00	77.22	9.81	458.00	206.30	32.87
<i>r2_a</i>	0.973	0.973	0.973	0.995	0.995	0.995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2.共同富裕水平异质性

本文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部分证实生态转移支付确实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为了进一步研究生态转移支付对不同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是否具有异质性效应,本部分借助分位数回归详细研究生态转移支付对不同共同富裕水平促进作用的异质性。估计结果如表 8 中所示,生态转移支付对 10 分位点上的共同富裕水平无显著促进作用,对 50 分位点及以上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在显著为正。总体来看,生态转移支付对具有较高共同富裕水平的地区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本身共同富裕水平较低地区不具有显著的作用,即生态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中存在“马太效应”。这主要由于经济水平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共同富裕水平相对较高地区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使得生态转移支付在推动共同富裕实现上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

表 8 共同富裕水平分位数回归

变量	(1)	(2)	(3)
	Q10	Q50	Q90
<i>did</i>	-0.2543 (0.31)	0.9168*** (0.34)	0.7721** (0.30)
<i>pgdp</i>	3.5227*** (0.30)	4.0505*** (0.30)	4.4103*** (0.37)
<i>density</i>	0.0309*** (0.00)	0.0295*** (0.00)	0.0230*** (0.00)
<i>open</i>	-0.1908*** (0.06)	-0.0947** (0.05)	-0.0733** (0.029)
<i>ratstr</i>	-9.4084* (4.96)	-12.4194*** (3.26)	-8.1329** (3.90)
<i>gov</i>	0.4822 (0.38)	-0.4822 (0.67)	-0.9040 (0.64)
<i>cons</i>	-0.9548 (5.73)	4.3481 (5.27)	10.6480* (6.27)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558	558	558
<i>r2_a</i>	0.918	0.932	0.959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3. 共同富裕指标分维度异质性

共同富裕是一个多维概念, 学者们对共同富裕的研究也是基于不同维度或是多维度的, 考虑到生态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不同维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部分参考已有研究, 从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个维度进行探讨(刘心怡等, 2022; 林海等, 2023)。衡量收入水平的指标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包括泰尔指数、地区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其中, 地区收入差距采用省级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各地区收入均值的离散值的绝对值来测度,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采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测度。回归结果如表 9 中所示, 模型(1)(2)(3)表明, 生态转移支付对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也可以看出, 相对于生态转移支付对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促进作用, 其对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强。模型(4)(5)(6)表明, 生态转移支付显著扩大了泰尔指数、地区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总体来看, 生态转移支付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但其对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强, 也就是生态转移支付扩大了收入差距。这进一步解释了上节中生态转移支付对较高共同富裕水平地区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生态转移支付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存在的“马太效应”。

表 9

共同富裕指标分维度回归

变量	收入水平			收入差距		
	(1) 人均可支配 收入	(2) 城镇人均可 支配收入	(3) 农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	(4) 泰尔指数	(5) 地区收入 差距	(6) 城乡居民收 入倍差
<i>did</i>	0.1047*** (6.37)	0.0992*** (6.00)	0.0756*** (6.97)	0.7393*** (4.45)	0.0375** (2.07)	0.0319* (1.75)
<i>pgdp</i>	0.2644*** (17.22)	0.2685*** (17.64)	0.1166*** (18.06)	0.5585*** (4.28)	0.0514*** (2.61)	0.0988*** (6.49)
<i>density</i>	0.0013*** (10.49)	0.0008*** (9.20)	0.0004*** (7.70)	0.0065*** (6.77)	0.0013*** (10.15)	0.0004*** (4.89)
<i>open</i>	-0.0024 (-1.38)	-0.0002 (-0.13)	-0.0032*** (-4.94)	-0.0968*** (-3.98)	0.0078*** (7.55)	-0.0065*** (-3.23)
<i>ratstr</i>	-1.1455*** (-7.63)	-0.5855*** (-3.27)	-0.2977** (-2.53)	-0.4000 (-0.12)	-1.0524*** (-6.49)	-0.6260 (-1.62)
<i>gov</i>	-0.0451*** (-2.64)	0.0261 (1.22)	-0.0041 (-0.50)	-1.2309*** (-2.75)	0.1861*** (6.42)	-0.3488*** (-4.91)
<i>cons</i>	0.9117*** (6.24)	1.0459*** (6.18)	0.3843*** (3.46)	6.9815** (2.30)	0.4502*** (3.11)	3.1380*** (8.58)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i>	558	558	558	496	558	558
<i>F</i>	192.60	144.30	175.30	38.19	55.65	31.07
<i>r2_a</i>	0.991	0.991	0.986	0.967	0.964	0.937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五、基本结论与政策启示

生态转移支付是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加快完成脱贫攻坚的重要政策安排。因此,系统阐释生态转移支付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机制,有助于充分发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政策优势。基于此,本文运用中国大陆地区 2003-2020 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因果推断方法,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生态转移支付对推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以及其中的机制,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生态转移支付政策不但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而且还有利于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并且其对共同富裕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第二,机制分析表明,生态转移支付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吸引外商投资以及改善营商环境,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生态转移支付对提高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从东部地区往中部和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对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且在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存在的“马太效应”。

以上结论对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挥生态转移支付的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优化生态转移支付的政策目标,将重点补助范围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相结合,促进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衔接,从而最大程度上发挥生态转移支付的政策效益。其次,针

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尤其不同共同富裕水平地区制定差异化政策，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并注重挖掘生态转移支付在缩小收入差距上的能力，将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精准识别和量化“共同富裕”指标，充分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和不平等程度，有利于更好地制定和实施政策，更准确地评估政策效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具体的参考和依据。

参考文献

曹鸿杰、卢洪友、祁毓，2020：《分权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财经论丛》第5期。

陈曦，2022：《以科技创新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和现实路径》，《经济纵横》第11期。

程名望、韩佳峻、杨未然，2022：《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财贸研究》第10期。

崔惠玉，2022：《共同富裕视阈下生态补偿财政政策研究》，《甘肃社会科学》第4期。

端利涛、蔡跃洲，2023：《平台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及实现路径——基于价值流转的机制分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郭健、谷兰娟、王超，2022：《税制结构与共同富裕——兼论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宏观经济研究》第4期。

侯孟阳、席增雷、张晓、姚顺波，202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效应评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1期。

姜晓萍、吴宝家，2022：《人民至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历程、成就与经验》，《管理世界》第10期。

李丹、裴育、陈欢，2019：《财政转移支付是“输血”还是“造血”——基于国定扶贫县的实证研究》，《财贸经济》第6期。

李红坤、祁永正，2022：《普惠保险、民营企业与共同富裕——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分析》，《保险研究》第8期。

李军鹏，2021：《共同富裕：概念辨析、百年探索与现代化目标》，《改革》第10期。

李实，2021：《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经济研究》第11期。

李实，2022：《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6期。

李实、杨一心，2022：《面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逻辑与路径选择》，《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李实、朱梦冰，2022：《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管理世界》第1期。

刘明慧、章润兰，2021：《财政转移支付、地方财政收支决策与相对贫困》，《财政研究》第4期。

刘培林、钱滔、黄先海、董雪兵，2021：《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管理世界》第8期。

刘心怡、黄颖、黄思睿、张桃霖，2022：《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金融经济研究》第1期。

林海、赵路彝、胡雅淇，2023：《数字乡村建设是否能够推动革命老区共同富裕》，《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孙继国、孙尧，2022：《共同富裕目标下金融科技是否促进了乡村产业振兴》，《财经论丛》，第11期。

孙鹏博、葛力铭，2021：《通向低碳之路：高铁开通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世界经济》第10期。

万广华、江葳蕤、赵梦雪，2022：《城镇化的共同富裕效应》，《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万海远、陈基平，2021：《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财贸经济》第12期。

王晨、罗丹、高自旺，2022：《国家级开发区对企业营商环境的影响——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宏观经济研究》第9期。

- 王昉、燕洪, 2022:《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与贫困治理:基本逻辑与思想转型》,《财经研究》第8期。
- 王桂虎、侯懿芮、王宇, 2022:《房地产金融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南方金融》第9期。
- 晏景瑞、朱诗怡、杜金岷, 2022:《金融科技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经济问题探索》第10期。
- 袁惠爱、赵丽红、岳宏志, 2022:《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共同富裕》,《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
- 张朝举、陈怡心, 2021:《生态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激励》,《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张化楠、接玉梅、葛颜祥, 2018:《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扶贫长效机制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第12期。
- 张金林、董小凡、李健, 2022:《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财经研究》第7期。
- 赵丽琴、李琳、王天娇, 2023:《我国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政策效应研究》,《经济问题》第2期。
- 周杰琦、张莹, 2021:《外商直接投资、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国际经贸探索》第1期。
- 周茂、陆毅、杜艳、姚星, 2018:《开发区设立与地区制造业升级》,《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
- 朱德云、王溪, 2022:《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第1期。
- Beck, T., R. Levine, and A. Levkov, 2010, “Big Bad Banks: The Winners and Losers from Bank De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5(5), 1637—1667.
- Cieplinski, A., S. D’Alessandro, T. Distefano, et al., 2021, “Coupling Environmental Transition and Social Prosperity: A Scenario-Analysis of the Italian Case”,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57, 265—278.
- De Chaisemartin, C., and X. D’Haultfoeuille, 2020, “Two-Way Fixed Effects Estimators with Heterogeneous Treatment Effe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9), 2964—2996.
- Fox, S., 2016, “Addressing the Causes of Mass Migrations: Leapfrog Solutions for Mutual Prosperity Growth Between Regions of Emigration and Regions of Immigration”, *Technology in Society*, 46, 35—39.
- Gardner, J., 2021, “Two-Stag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 *NBER Working Paper*.
- Goodman-Bacon, A., 2021,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Variation in Treatment Timing”,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25(2), 254—277.
- Mallawaarachchi, T., and D. B. Rahut, 2023, “Realising Rur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to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Prosperity in Post-COVID-19 Asia”,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77, 1076—1082.
- Molero-Simarro, R., 2017, “Inequality in China Revisited. The Effect of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on Urban Top Incomes, the Urban-Rural Gap and the Gini Index, 1978–201”, *China Economic Review*, 42, 1076—1082.
- Tang, J., J. Gong, W. Ma, et al., 2022, “Narrowing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The Role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75, 74—90.
- Tang, L., and S. Sun, 2022, “Fiscal Incentives,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80, 102057.

The Impact of Ecological Transfer Payment on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Summary: The ecological transfer payment policy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ompensation perspective is an important policy tool for vertical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allocation to promot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context of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Mainland China between 2003 and 2020,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with the 2008 pilot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 transfer payment policy as the policy shock,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transfer payments on achieving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logical transfer pay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them, increasing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improv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are important mechanism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romoting effect decreases from eastern regions to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turn, and there is a "Matthew effect" that has a strong promotion effect on regions with a high 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have certain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alleviating the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problem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ly exerting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of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Keywords: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ecological transfer payment; common prosperity; difference-in-difference